

心理学视角下的价值观冲突：影响及其理论解释*

岳童¹ 王洪² 李庆功³ 任晓筱⁴ 张欣怡¹

(¹ 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² 重庆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重点实验室, 重庆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重庆 401331) (³ 浙江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智能实验室, 金华 321004)

(⁴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西安 710062)

摘要 价值观冲突是指个体之间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产生的相互否定和竞争现象。在当前心理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中, 价值观冲突通常分为两类: 一类是因价值观念或身份无法兼容而引发的长期冲突, 另一类是由价值两难选择任务引发的即时冲突。这两类冲突都可能导致一系列消极的心理影响, 例如增加压力感知、焦虑水平和心理紧张度。研究者主要从价值观背后的动机对立性和自我概念完整性的威胁感知两个方面, 来解释价值观冲突的产生原因及其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价值观冲突的产生机制, 扩展对调节因素的认识, 并揭示其对个体的影响, 以开展相应的调节与干预研究。

关键词 价值观冲突, 价值观理论, 自我概念威胁, 价值观环状连续体

分类号 B848

1 引言

价值观是人们判断是非、善恶、得失的信念系统, 它不仅引导我们追寻理想, 还决定了每个人在生活中的各种选择(黄希庭, 2014)。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的交流融合, 人们越来越多地面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旧的与新的等一系列尖锐的观念矛盾与碰撞。在这种背景下, 传统、保守的价值观念在延续的同时, 对新价值观的确立造成了阻力; 而新的、现代的价值观念则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展现出勃勃生机。此外, 随着传统价值观的破除, 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相适应的新价值观体系尚未完全确立, 导致了价值观的真空(秦慧源, 2018)。在这一过程中, 个体之间由于不同价值观念而产生的相互否定和竞争现象被称为价值观冲突(conflicts of value)

(袁贵仁, 1991)。

中国人最熟悉的价值观冲突莫过于“忠”与“孝”之间的矛盾。《韩诗外传》中,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 执法官石奢释放了犯下杀人罪的父亲, 陷入了一个难以解开的价值困境: 一方面, “以父成政, 非孝也”; 另一方面, “不行君法, 非忠也”。在现代社会, 价值观冲突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例如, 传统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家庭责任和尊重长辈, 而现代价值观则更注重个人主义, 强调个体自由、平等与权利。由于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在优先事项和行为规范上存在根本性差异, 这些冲突容易在家庭、职场和社交场合中出现, 导致人们在生活中面临困惑与挑战(Inglehart & Baker, 2000)。研究表明, 家庭责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在现代中国家庭中尤为明显。例如, 张春泥和史海钧(2019)通过对现代中国家庭中性别情境的分析发现, 许多年轻人在追求个人发展时, 尤其是女性, 常常不得不面对与家庭责任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 性别观念的差异和家庭角色的预期使得女性在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 人们难以容忍观念世界中不同指导原则的

收稿日期: 2024-02-08

*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4SKJD071)、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联合实施项目(4322400175)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方法创新专项课题(23SYS09ZD)资助。

通信作者: 王洪, E-mail: 20131691@cqnu.edu.cn

共存,否则将感受到价值观之间的强烈碰撞与冲突,进而影响观念世界的心灵秩序,甚至危及心理健康水平。

在当今价值观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中,现代人固有的观念秩序越来越受到不同理念的挑战,价值观冲突问题也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心理学实证研究领域对价值观冲突进行了广泛探讨。如果将个人的价值观视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那么在与环境信息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某些重要价值观倾向于保持稳定,而另一些则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种稳定性或易变性与其心理表征和加工特点密切相关。因此,不同价值观念相互否定和竞争所带来的冲突,可以看作是个体价值观系统的一种不稳定状态。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价值观冲突在何种情境下产生?它会对个体产生怎样的影响?价值观冲突的心理机制和理论解释是什么?本文将在梳理现有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和探讨,以期对深入理解这一心理现象及未来的调和和干预提供理论启示。

2 价值观冲突的产生情境及具体表现

目前,心理学领域关于价值观冲突的实证研究通常将其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长期存在的价值冲突,这种冲突通常源于个体同时认同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观,或者在兼具不同身份时,难以有效调和这些身份背后的价值取向。这类冲突往往具有持续性,并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另一类是实验室环境下诱发的即时冲突,通常通过设置价值两难任务来营造冲突情境,从而观察这些情境对个体瞬时身心状态的影响。本文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些冲突划分为长期冲突和即时冲突两类,以更加系统和清晰地揭示不同类型价值观冲突的心理机制和影响。

2.1 价值观念或身份无法兼容引发的长期冲突

当个体在价值观选择上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或在长期内未能有效整合矛盾的价值观念时,价值观冲突可能会持续困扰他们。这种长期冲突往往会导致个体内心持续感受到心理压力和焦虑,并逐渐侵蚀他们的幸福感。正因为此类冲突具有持续性且难以调和,本文将其归类为“长期冲突”,并认为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深远且广泛。

价值观选择带来的长期冲突表现之一是某些

个体可能同时认同相互矛盾的观念,这使得他们的价值观世界处于不稳定状态,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对个体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例如,Burroughs和Rindfleisch (2002)研究了长期持有对立价值观对个体心理层面的消极作用。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对于认同高集体定向价值观(如宗教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的个体而言,越是同时认同物质主义价值观,其心理紧张或冲突水平越高,表现为更高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同时会削弱其幸福感受能力。也就是说,既看重集体定向价值观,又将物质主义作为生活重要目标的个体,可能会持续处于一种冲突和矛盾状态,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及幸福感。同样,Furchheim等人(2020)的研究发现,若被试长期在环保主义和物质主义立场之间犹豫不决,即在绿色价值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上均得高分,他们往往主观报告出更强的压力感知水平,这种压力感也进一步导致其生活满意度的降低。此外,那些存在神经症功能障碍(如焦虑症)的个体,混乱的价值观认同模式也可能是其心理症状的关键因素之一(Lange & Pauli, 2019)。例如,Arens等人(2022)采用肖像价值问卷(Portraits Value Questionnaire, PVQ)调查了情感障碍、对严重压力的反应、适应障碍等情绪问题患者的价值观认同情况。结果发现,他们相比健康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价值观矛盾和冲突模式,如一方面特别强调个人成功,另一方面也将群体利益最大化置于同等重要的程度。

长期的价值观冲突还可能表现为个体在不同身份(如工作和家庭角色)之间难以兼顾,导致一系列消极的心理影响。价值观通常被认为是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个体在不同身份之间切换时,身份背后的价值观也会随之凸显(Horton et al., 2014)。然而,当不同身份提供不兼容的价值观(如素食主义者和猎人)时,这些价值观不能同时作为个体意义的来源(Rabinovich & Morton, 2016),反而可能产生紧张关系(Morgenroth et al., 2021),进而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Rafaeli-Mor & Steinberg, 2002),甚至带来不适和痛苦等心理困扰(Bernuzzi et al., 2022; Huhtala et al., 2020)。例如,Rabinovich和Morton (2016)通过实验情境诱发被试在不同身份之间的价值取向冲突,如作为学生和作为子女的价值要求不同(实验1),作为母亲和作为全职员工的角色定位矛盾(实验4)。这种身份

冲突实际上反映了背后价值观的差异:学生身份强调个人成就和学术追求,而子女身份则强调家庭责任和孝顺;母亲身份强调家庭照顾和情感支持,而全职员工身份则强调职业发展和工作投入。结果发现,诱发被试不同身份背后的价值取向冲突后,他们主观报告的幸福感和自尊水平显著降低。这些冲突迫使个体在内在信念和外在行为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可能导致心理困惑和不满。Veage 等人(2014)采用卡片排序任务(Card Sorting Task, SGP),发现心理健康从业者(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注册护士等)的个人生活价值观和工作要求的价值观一致性程度显著提升其幸福感和成就感,同时有效预测职业倦怠水平的降低。另一个国外经常讨论的身份冲突问题是,即使在堕胎、医生协助自杀、安乐死或参与死刑合法化的地区,天主教医生也可能拒绝执行这些行为,因为这些行为违背了他们的宗教价值观。然而,这样的选择可能违背履行患者意愿的职业义务,导致身份冲突。在医学背景下,职业和个人(如宗教)身份的价值观冲突被认为是医生倦怠、压力和情绪紧张的重要来源(Hayes et al., 2017; Huhtala et al., 2020),并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Carminati & Héliot, 2023)。

综上所述,由于价值观念或身份无法兼容引发的长期冲突,不仅使个体在价值选择上长期无法找到平衡,更对其心理健康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正因为这些冲突具有持续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它们常常难以通过简单的行为调整来缓解,从而成为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长期冲突在表现形式和心理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西方文化中,个体更倾向于通过自我反思和个人发展来应对冲突,而在东亚文化中,个体则更倾向于通过社会支持和集体主义的方式来缓解冲突对幸福感的影响(Sagiv & Schwartz, 2022)。这种文化差异强调了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理解和处理价值观冲突的必要性,未来研究应继续探索这些差异对个体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

2.2 价值两难选择任务引发的即时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面临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还是“孝”的两难选择,并被要求即时给出确定答案。这类冲突通常是短暂而强烈的,个体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艰难的价值选择。

许多心理学研究利用价值两难选择任务来还原这种情境,以探讨个体在面对瞬时决策时的心理冲突表现。这种类型的冲突,因其突发性和即时性,被归类为“即时冲突”,其特点在于个体会在短时间内体验到强烈的内部矛盾和心理压力。

例如,Leszkowicz 等人(2017)要求被试在不同价值观词组间快速选择,判断哪种理念对自己更为重要,并在此过程中记录个体的大脑激活情况。研究发现,当被试面对两种难以兼容的价值观(如“仁爱”vs“财富”)时,冲突较为明显,选择更为简单;而在面对两种通常被人们同时看重的价值观(如“仁爱”vs“友善”)时,被试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且在冲突加工相关脑区(如辅助运动区、背外侧前额叶和前扣带回)上显示出更强的激活。这些脑区的激活从神经加工层面反映了个体的冲突感知。陆娟芝等人(2019)借鉴“猜硬币”范式,设置有机会撒谎和无机撒谎两种条件,以考察被试是否会为了助人行为而选择撒谎,即在实验室情境下营造“利他”与“诚信”之间的价值两难选择。结果发现,个体在面对这种即时选择时,激发了更强的N2脑电成分,而该脑电成分在以往研究中被认为是反映冲突检测及认知控制的过程。以上研究表明,当个体面对价值两难选择时,无论是大脑的相关区域激活,还是电生理指标,都会显示出明显的冲突感知。

一般情况下,上述价值两难选择任务所引发的即时冲突感知通常较轻微,不足以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然而,如果需要进行两难选择的价值观都是人们特别珍视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选择的难度会明显增大,并可能带来因迫选而产生的强烈心理冲突,甚至紧张和焦虑等消极心理状态。例如,李静和郭永玉(2012)的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将物质主义和儒家传统价值观都视为重要价值理念的被试,相比于只认同单一价值观的个体,在反映物质主义与儒家传统价值观冲突的两难情境中进行迫选时,皮电强度值更大,这说明他们在选择时会经历更强的内心紧张感。同样,Tang 和 Li (2021)让既认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又看重道德伦理价值的大学生被试在五种道德两难选择任务(如与女朋友保持苦涩的异地恋,或者放弃现女友并与一个更美丽富有的女孩结婚)中进行迫选,结果发现这些被试相比于只认同某一种价值观的被试,主观报告的

状态焦虑水平更高。Mahmoudfakhe 等人(2023)在研究中比较了接纳与承诺疗法和自我慈悲疗法对焦虑女性学生的认知灵活性的影响,发现价值观冲突的情境会显著增加个体的心理紧张感,尤其是在即时决策中。可以进一步推测,价值观对于个体越重要,其产生的价值观冲突水平也越高,进而对个体心理状态的消极影响也越强。

总之,价值两难选择任务引发的即时冲突,通常会在个体面对难以兼容的价值观时,迅速引发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情绪反应。这类冲突的突发性和短期影响使得个体在较短时间内经历显著的情绪波动,如焦虑和紧张感的增加。这种即时冲突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价值观在瞬时情境下如何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并揭示了其在不同情境中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的短期影响。

2.3 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价值观冲突的深入分析,提出了长期冲突和即时冲突的分类框架。长期冲突通常源于个体无法在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之间找到最终的平衡,导致持续的心理压力、焦虑,以及幸福感的下降;即时冲突则多发生在面对需要快速决策的两难情境时,表现为短期内的强烈心理矛盾。通过这种分类,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冲突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多样性影响,还为理解这些冲突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具体表现来看,无论是长期存在还是即时产生的价值观冲突,都会使个体处于价值取向的不确定状态,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如焦虑、压力等消极情绪),并可能成为幸福感水平降低的重要因素。而且,越重要的价值观,个体越难以抉择,由此产生的价值观冲突程度也就越强。那么,这种因不同价值观念同时“在线”而引发的消极冲突感受究竟来源于何处呢?接下来,本文将结合已有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结果进行阐述。

3 价值观冲突的理论解释

3.1 冲突来源于价值观在动机上的对立性

许多研究者认为,动机对立性(motivational opposition)指的是不同价值观在动机上处于对立状态。由于这些对立的动机会在个体的观念世界中共存,进而导致碰撞和冲突。这一观点基于 Schwartz (1992)提出的价值观环状结构理论,其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框架来理解和分类人类的基本

价值观。该理论假设,人类价值观体系整体上是 由 10 类价值观构成的动机性连续体,这些动机类型存在于任何一种文化中,因为它们源于三种普遍的人类需求:生物需求、社会交往需求,以及群体生存和福祉的需求。基于这 10 种基本动机类型,价值观被划分为 10 大基本类型,并强调这些动机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彼此相容或对立的,呈现为一个环状结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相邻的价值观在动机上相似,而对立的价值观则处于圆环的相反位置。由于这些价值观表达了不同的目标和动机,它们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例如,追求自我提升的价值观(如成就和权力)可能与自我超越的价值观(如普遍主义和仁爱)发生冲突,因为前者注重个人成功和优势,而后者强调关爱他人和社会和谐(Schwartz, 1992)。

Schwartz 关于价值观系统的动机性假设目前已经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一方面,大量研究发现,涉及价值观的认同与评价往往与个体的情感体验密切相关。例如, Zahn 等人(2009)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当个体想象发生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件时,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同时伴随眶额叶外侧(lateral orbitofrontal cortices)、背外侧额叶及前脑岛(insular cortex)的激活,而这些脑区在之前的研究中被报告与负性情绪感受有关(Seymour et al., 2007)。当个体经历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件时,也会产生自豪感,对应的是中脑边缘区域奖赏系统的激活。Bansal 等人(2023)的研究指出,个体的情感体验往往与其所认同的价值观保持一致。例如,认同自我超越价值观(如仁爱)的人更倾向于体验同情等积极情感,而认同自我提升价值观(如权力)的个体则更倾向于体验愤怒或自豪等具有攻击性或优越感的情感。这说明,价值观本身具有不同的动机情感意涵。另一方面,通过跨年龄的纵向发展研究也可以验证 Schwartz 模型中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相容或不兼容关系。例如,无论是对儿童(Daniel et al., 2021)还是成年人(Smallenbroek et al., 2023)价值观发展趋势的追踪,都发现随着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维度相关价值观重要性的提升,与之动机不兼容的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维度价值观会随之减弱,而与之动机相容的保守(conservation)维度价值观的变化则不受影响。此外,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这种趋势愈发明显(Daniel et al., 2021)。近年来,

有研究者采用经验抽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在自然情境中实时捕捉个体的决策与行为(如在7天内进行连续测量),以考察价值观状态(value states)的重要性层次是否与个体在价值观量表中得到的结构一致。结果也发现了相容与对立关系,即在同一行为中不能同时追求相互竞争的价值观(Skimina et al., 2018, 2021)。

Schwartz 提出的价值观系统的相容与对立关系为价值观冲突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同时追求动机对立的价值观对个体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根据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理论,人们有保持自身认知一致性和连续性的需求,而不同观念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否定会破坏认知加工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如果个体同时认同并企图将这些对立的价值观纳入自己的观念体系中,它们便会在动机上形成一种紧张状态(Markauskaitė & Rūtelionė, 2022)。例如,之前的研究中,物质主义与集体定向价值观(Burroughs & Rindfleisch, 2002)、物质主义与绿色价值观(Furchheim et al., 2020)以及物质主义与儒家传统价值观(李静,郭永玉, 2012)在 Schwartz 的价值观模型中均代表了享乐与遵从/传统的对立关系。物质主义强调个人欲望的满足,而集体定向、绿色和儒家传统价值观则强调控制个人冲动并适应社会规范。因此,一旦个体同时认同这些对立的价值观,其观念世界便可能处于动机与情感上的对立状态,随之产生压力、紧张和焦虑情感。对于解释身份不兼容而引发的冲突,研究者也遵循了类似的逻辑。例如,Carminati 和 Héliot (2023)在解释医生的职业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冲突时指出,不同身份背后的价值观念不一致会导致医生出现明显的身份混乱,而协调相互竞争的价值观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进而消耗心理资源与能量,最终降低医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

然而,从已有研究结果来看,仅从价值观动机上的对立性角度并不足以全面解释价值观冲突及其消极影响。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即使同时认同动机上不兼容的价值观,也不一定会表现出心理上的冲突感。例如,Foad 等(2020)在研究中要求被试报告他们未来可能看重的价值观,以从个体的主观预期层面考察价值观随时间变化的轨迹。结果发现,被试预期自我超越和自我增强价值观在重要性上同等程度增长,并没有表现出之前研

究中的对立模式。Wang 等(2021)对香港教师的调查结果也发现,他们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型价值观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个人身上也没有产生明显冲突感,并共同促进这些教师对学校的承诺和认同。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同时认同相容的价值观难以进行选择也会引发价值冲突,而这种情况难以通过价值观动机上的对立性来解释。例如,Leszkowicz 等人(2017)的研究发现,能够使个体感知到心理冲突的迫选词组来自于相容关系而非对立关系的价值观任务(因为正常个体一般不会兼具存在对立关系的价值观)。又如,在价值观研究领域经常讨论的“仁爱-诚信冲突”(benevolence-integrity conflicts),从动机维度上也都隶属于自我超越维度。以上“例外”情况提醒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价值观动机上的对立性可能并非解释价值观冲突及其负面心理影响的唯一因素。

3.2 冲突来源于违反自我概念一致性的威胁感知

一些研究者认为,不同价值观之间同时“在线”所带来的冲突及其负面心理影响,是个体应对自我概念一致性威胁的表现,即价值观冲突来源于自我概念层面。

已有关于价值观的心理及神经结构的研究表明,价值观在人们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知觉中处于核心地位(王洪等, 2021; 岳童等, 2020, 2021; Aquino & Reed, 2002)。人们在价值观上的碰撞与对抗往往涉及到自我卷入(self-involvement)的过程(Kouzakova et al., 2012)。对于个体来说,越是重要的价值观(如保护性价值观或神圣价值观),其在表征和建构上与自我概念的关系就越为紧密。因此,人们在价值观上的碰撞与对抗往往涉及自我卷入过程,在其中进行取舍往往意味着采用何种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例如,在仁爱-诚信冲突中,评委如果想要照顾弱者,就不太可能兼顾评判的公正,这涉及到助人与公正自我概念之间的对立和选择。关于自我概念的既有研究发现,人们有保持自我概念一致性和完整性的倾向(Cohen et al., 2007)。根据自我不一致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当一个人拥有相互冲突或不兼容的自我概念时,他们可能会经历心理上的不适或痛苦(Higgins, 1987)。在此基础上,许多研究者认为,个体面对不同价值观之间竞争和排序时所感受到的自我概念一致性威胁,才是引发价值观冲突及其一系列消极影响的心理根源(陶爱华

等, 2018; Harinck & Ellemers, 2014)。

一些基于价值观两难选择情境的实验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以上理论假设。例如, Kaplan 等(2016)结合个体大脑神经活动结果, 发现价值观在神经表征上确实涉及大脑的自我身份认同、道德判断和社会情绪加工过程。如果在实验情境中让被试在其看重的价值观上面对两难选择(自由主义 vs 保守主义), 会发现他们的默认网络相关脑区有明显的激活, 而且经历越多价值冲突的个体, 其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脑岛(insula)和杏仁核(amygdala)的活动程度越强。Kaplan 等认为, 该结果可能说明, 被试的价值观与自我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结使其在经历价值选择和动摇时感受到了自我概念上的不确定性, 进而激发出更强的情绪反应, 而这或许是导致后续一系列消极反应的起点。Schuster 等(2020)在实验室中通过酒店选址这一话题营造了保护环境还是保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两难情境, 并让被试进行辩论以诱发出价值观冲突。结果也发现, 经历价值观冲突后, 被试自我概念的积极性会受到贬损, 产生了更多的负面情绪, 并对辩论结果的满意度较差。也就是说, 不同价值观彼此否定和相互竞争引发的自我概念完整性和一致性的威胁感知, 才是心理冲突及其相应消极影响的心理根源。

如果个体不易在价值观的彼此否定和相互竞争过程中感受到自我概念一致性的威胁, 其感受的心理冲突水平也应当随之减少。在当前的一些实证研究中, 确实发现了相应的证据, 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价值观冲突来源于违反自我概念一致性的威胁感知的观点。Rabinovich 和 Morton (2016)的研究表明, 当被试面临不同身份带来的价值观两难选择时(如校园生活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 只有那些将自我概念视为固定和稳定的个体, 其幸福感和自尊水平才会下降。相反, 倾向于将自我概念视为灵活多元的个体(即辩证性自我, dialectical self), 则较少受到价值观冲突的负面影响。Furchheim 等(2020)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同时认同物质主义和环保价值观会增加心理压力, 并降低生活满意度。这种负面影响通过自我概念清晰度(self-concept clarity)来实现, 并且由个体对自我概念一致性的偏好所调节。即, 越是不关注自我概念一致性的个体, 价值观冲突带来的负

面心理影响越小。同样, Xie 等(2022)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也发现, 一些人在对立的价值观维度上得分均比较高, 但并没有明显的价值观冲突表现。在对此结果进行解释时, Xie 等认为, 中国儒家的中庸思想使得中国被试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辩证思维特征, 可以将个体与社会取向、传统与现代价值取向进行融合而不产生冲突, 这也与前人关于东亚人在不同情境中持有更多变的、情境化自我观念的解释一致(Joo & Cross, 2021)。

3.3 小结

综上所述, 对于为何相互竞争和排序的价值观会给个体带来心灵上的冲突及随后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 一是一些研究者关注价值观背后的固有机, 认为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其代表的动机具有对立性; 二是一些研究者强调价值观与自我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 认为价值观的冲突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个体在此过程中感受到的自我概念一致性威胁有关。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 从自我概念一致性威胁的角度来看待价值观冲突问题似乎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因为它可以有效弥补从价值观动机对立性解释冲突时的不足(如前文所提及的相容价值观竞争与排序也能产生内心冲突的问题)。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理论解释不能兼容。事实上, 价值观既具有相应的情感动机特性, 又与人们的自我概念紧密相关, 因此许多价值观冲突既有动机上的对立性, 又涉及个体为了维护自我概念完整性和一致性而产生的消极情感反应。

4 总结与展望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的爆炸性增长, 不同文化、信仰、生活方式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纷繁复杂的图景。个体内部的价值冲突不仅影响人们的选择和行为, 也对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 价值观冲突日益凸显, 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话题。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 从心理学视角对价值观冲突的表现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探讨。具体而言, 本文区分了两种主要的价值观冲突类型: 即时冲突和长期冲突。即时冲突主要通过价值两难选择任务引发, 导致个体在短时间内体验到强烈的心理冲

突感；而长期冲突则源于个体在不同价值观念或身份无法兼容时的持续内心矛盾，影响更加深远。在对价值观冲突产生机制的解释上，本文总结了两种主要的理论视角：一是基于价值观背后的动机对立性，认为不同价值观在动机上的不兼容性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二是基于自我概念完整性的威胁，认为价值观冲突会引发个体对自我概念一致性的担忧，从而导致心理上的不适感。本文的创新性在于对价值观冲突的表现和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区分和分析，为理解价值观冲突的产生和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综上所述，价值观冲突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迫切性的议题，而目前心理学领域内的实证研究才刚刚起步，未来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探讨。

4.1 需要明确价值观冲突的产生机制

目前，虽然研究价值观冲突的范式和技术手段众多，但仍然缺乏公认的测量标准。本文中所指的价值观冲突，包括长期冲突和即时冲突，具体体现为个体在持有矛盾价值观或身份认同时产生的心理对立和竞争。一些研究者通过价值两难选择情境中大脑冲突监控脑区的激活或电生理指标来表征价值观冲突的产生，还有一些研究者通过个体主观报告的压力或焦虑水平来衡量价值观冲突的大小。然而，这些测量指标要么难以直接比较，要么是从结果上反推价值观冲突的产生，始终无法精准捕捉到衡量变量的有效指标。这给相关领域的比较和交流带来很大障碍，因此确定能够准确衡量个体价值观冲突水平的量化指标可能是下一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是：价值观冲突的心理作用机制究竟为何？虽然既有研究已经从价值观的情感动机角度及与自我概念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理论解释，但相关研究多是间接证据。未来可以借助脑科学的相关技术与方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例如，Senftleben 和 Scherbaum (2021)将不同价值观竞争和排序所带来的冲突称为主观冲突(subjective conflicts)，其中并不涉及选择的对与错；与之相对，他们将抑制控制任务(inhibitory control tasks)中需要认知资源竞争而产生的冲突定义为客观冲突(objective conflicts)，而在这个过程中便有正确反应与错误反应之间的区分。他们借助于额中部theta波(在之前的研究中被认为是在冲突监控和探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可以反映个体

在不同反应和选择中的认知资源竞争过程)(Töllner et al., 2017; Zavala et al., 2018; Zhao et al., 2015)发现，该指标对冲突感知的预测作用仅在抑制控制任务中显著，在主观价值选择任务中则不显著。据此，他们认为主观价值选择冲突与客观认知冲突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前者存在更多的自我控制及主观权衡过程，这为从自我加工角度理解价值观冲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4.2 需要扩展对价值观冲突调节因素的认识

价值观冲突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可能受到许多心理因素的调节，而这些变量在目前的研究中都少有涉及。例如，从人们的经验和已有研究结果来看，涉及价值观的对立与选择并不必然会产生价值观冲突感知，构成竞争与选择的价值观对个体的重要程度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许多研究者认为，个体的价值观系统具有等级结构(hierarchies)特性(Brosch et al., 2011; Schwartz, 2012)：越是位于系统核心层级的价值观，其重要性及认同程度越高，而不同重要等级的价值观在认知加工模式上也存在差异(岳童等, 2021; Yue et al., 2021)。这提醒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未来在探讨价值观冲突问题时，相应价值观在个体观念系统中的层次应当被纳入考虑范围。另外，从已有研究来看，价值观冲突往往受到文化差异的显著影响，尤其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其独特的辩证思维特性使得个体能够将个人与社会的取向、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观念相融合，从而避免直接的冲突(Xie et al., 2022; Yanagisawa et al., 2017)。例如，Yanagisawa 等(2017)的研究显示，在面临需要在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做出选择时，东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往往倾向于通过调和或妥协来化解冲突，从而减少心理压力。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体更可能坚持个人的自主性，即使面临更大的冲突感和心理压力(Au & Lam, 2017)。这种文化差异不仅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对价值观冲突的调节作用，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探讨文化因素如何进一步影响个体心理状态的路径。特别是在长期冲突和即时冲突的表现形式和影响机制上，文化背景可能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关于自我建构的研究也揭示了不同倾向对于价值冲突解决的影响：依存型自我建构的个体更易于展现出宽容和解的态度，有助于化解矛盾；而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个体则更可能在人际交往中占据主导，这可

能会增加价值观冲突的风险(Au & Lam, 2017)。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索文化因素如何调节价值观冲突的产生与解决,这可以为更深入理解人们的交往方式乃至国际关系提供进一步的思考。

4.3 需要进一步揭示价值观冲突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已有研究初步揭示了价值观冲突的负面作用,如提升个体的压力感知、焦虑水平、心理紧张度和职业倦怠水平,降低幸福感等。而且,构成冲突的价值观对人们越重要,其对个体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明显。然而,其中仍有许多问题尚未揭示清楚。例如,因为价值观念或身份无法兼容引发的长期冲突和价值两难选择任务引发的即时冲突,对个体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同?个体内部的价值观冲突与人际价值观冲突(interpersonal value conflict)(岳童等, 2024)在影响效果和路径上是否存在明显差异?究竟是价值观冲突引发了个体相应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是存在焦虑、压力等心理症状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价值观冲突?围绕以上问题,研究者已经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例如, Daniel 等(2021)的研究表明,随着儿童青少年认知的发展,他们头脑中的价值观系统可能会经历几轮从价值观冲突到稳定的过程,这需要进行主动的认知调整,否则会带来发展性的心理问题。Brandt 等(2019)进一步采用日记追踪法,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个体经历的价值观冲突能够预示其更高的消极情绪反应、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以及幸福感的降低。这一发现突显了价值观冲突的程度或频率在塑造人们价值观以及维护心理健康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未来,可望通过长期、纵向的追踪研究,进一步挖掘这一现象的深层机制及其影响。

4.4 需要开展价值观冲突的调解与干预研究

如前文所述,经历价值观冲突的个体往往会经历一系列消极的心理感受,影响他们的情绪状态、工作和生活满意度。因此,从价值观的视角对心理冲突问题进行调解和干预,可以为个体心理健康的改善和提升提供新的视角。然而,由于关于价值观冲突的探讨刚刚起步,关于其调解和干预的实证研究仍较为缺乏。即便如此,许多研究者也从理论层面提出了可行的方案,值得在未来的咨询与实践过程中进行检验和丰富。例如, Arens 等(2022)提出,心理咨询师可以通过进行认

知重构、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进行合理的自我引导等方法,帮助处于价值观冲突困扰中的个体摆脱因价值观不确定而带来的心理困扰。Carminati 和 Héliot (2023)在论及医生职业身份与宗教身份的冲突干预策略时,提出可以通过外部情境的力量支持深陷其中的个体,帮助他们有效面对价值观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他们认为,积极的社会支持和道德氛围有助于调节医生的职业-宗教身份冲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促进组织团队内部更大程度的一致性和凝聚力。另外,在调解因人际间价值观差异带来的心理冲突时,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的方法(要求被试写下对自己重要的价值观,以此巩固其自我概念的正当性)已经被证明可以取得良好效果。原因在于个人可以利用包括价值观在内的资源库来恢复他们对自我完整性和价值感的认知。未来研究可以借鉴这一方法,考察其在调解个人长期冲突和即时冲突过程中的作用。

总之,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价值观冲突的现象、心理影响及其产生机制,为理解和应对这一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价值观冲突不仅仅是简单的认知矛盾,而是深刻影响个体自我认同和心理健康的复杂现象。未来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内在机制和文化差异,同时开发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价值观冲突,提升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 黄希庭. (2014). *探究人格奥秘*. 北京: 商务出版社.
- 李静, 郭永玉. (2012). 大学生物质主义与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冲突研究. *心理科学*, 35(1), 160-164.
- 陆娟芝, 廖冲, 关青, 罗跃嘉, 崔芳. (2019). 利他与利己动机下的欺骗行为. *心理科学*, 42(4), 905-912.
- 秦慧源. (2018). 新时代中国的价值观冲突及其超越. *东南学术*, (6), 10-17.
- 陶爱华, 刘雍鹤, 王沛. (2018). 人际冲突中失望的个人效应及冲突类型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报*, 50(2), 235-242.
- 王洪, 岳童, 符明秋. (2021). 从情感认同到自我认同: 价值观认同的内隐实验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 5, 64-73.
- 袁贵仁. (1991). *价值学引论*.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岳童, 黄希庭, 徐颖, 潘思存. (2020). 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可变性: 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8(12), 2091-2101.
- 岳童, 黄希庭, 傅安国. (2021). 人们何以能够“舍生取义”? 基于保护性价值观认知神经机制的解释. *心理科学进展*, 29(3), 40-548.
- 岳童, 王洪, 傅安国, 徐浩, 李文俏. (2024). 为何人际价

- 值观冲突难以达成共识? 理论解释及调解策略. *心理学进展*, 32(9), 1528–1538.
- 张春泥, 史海钧. (2019). 性别观念, 性别情境与两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来自跨国数据的经验证据. *妇女研究论丛*, 153(3), 26–41.
- Aquino, K., & Reed II, A. (2002). 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6), 1423–1440.
- Arens, E. A., Christoffel, M., & Stangier, U. (2022). Value priorities and value conflicts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compared to a general population sample. *Scientific Reports*, 12(1), 3974.
- Au, A. K., & Lam, S. F. (2017). Understanding response patterns in dyadic conflict: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combining self-construal and opponent's dominance-submissive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2(2), 116–125.
- Bansal, Y., Malhotra, D., & Khosla, M. (2023).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s and self-conscious emotions: Implications for emotional well-being. *Journal of Emotional Research*, 15(3), 123–139.
- Bernuzzi, C., Setti, I., Maffoni, M., & Sommovigo, V. (2022). From moral distress to burnout through work-family conflict: The protective role of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refocusing. *Ethics & Behavior*, 32(7), 578–600.
- Brandt, M. J., Crawford, J. T., & Van Tongeren, D. R. (2019). Worldview conflict in daily lif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0(1), 35–43.
- Brosch, T., Coppin, G., Schwartz, S., & Sander, D. (2011). Generating value (s): Psychological value hierarchies reflect context-dependent sensitivity of the reward system. *Social Neuroscience*, 6(2), 198–208.
- Burroughs, J. E., & Rindfleisch, A. (2002). Materialism and well-being: A conflicting valu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9(3), 348–370.
- Carminati, L., & Gao Héliot, Y. (2023). Multilevel dynamics of moral identity conflict: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values in ethically-charged situations. *Ethics & Behavior*, 33(1), 37–54.
- Cohen, G. L., Sherman, D. K., Bastardi, A., Hsu, L., McGoey, M., & Ross, L. (2007). Bridging the partisan divide: Self-affirmation reduces ideological closed-mindedness and inflexibility in negoti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3), 415–430.
- Daniel, E., Döring, A. K., & Cieciuch, J. (2021). Development of intraindividual value structures in middle childhood: A multicultural and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91(2), 482–496.
- Foad, C. M., Maio, G. G., & Hanel, P. H. (2020). Perceptions of values over time and why they matt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9(4), 689–705.
- Furchheim, P., Martin, C., & Morhart, F. (2020). Being green in a materialistic world: Consequences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y & Marketing*, 37(1), 114–130.
- Harinck, F., & Ellemers, N. (2014). How values change a conflict. In C. K. W. De Dreu & P. A. M. Van Lange (Eds.), *Social conflict within and between groups* (pp. 33–50). Psychology Press.
- Hayes, B., Prihodova, L., Walsh, G., Doyle, F., & Doherty, S. (2017). What's up doc? A 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hospital doctors in Ireland. *BMJ Open*, 7(10), e018023.
- Higgins, E. T. (1987). Self-discrepancy: A theory relating self and affect. *Psychological Review*, 94(3), 319–340.
- Horton, K. E., Bayerl, P. S., & Jacobs, G. (2014). Identity conflicts at work: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5(S1), 6–22.
- Huhtala, M., Fadjukoff, P., & Kroger, J. (2020). Managers as moral leaders: Moral identity processes in the context of work.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72(4), 639–665.
- Inglehart, R., & Baker, W. E.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1), 19–51.
- Joo, M., & Cross, S. E. (2021). A double-edged sword: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lications of the dialectical sel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8(4), 961–977.
- Kaplan, J. T., Gimbel, S. I., & Harris, S. (2016). Neural correlates of maintaining one's political beliefs in the face of counterevidence. *Scientific Reports*, 6(1), 39589.
- Kouzakova, M., Ellemers, N., Harinck, F., & Scheepers, D. (2012). 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conflict: How disagreement on values affects self-involvement and perceived common groun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6), 798–807.
- Lange, B., & Pauli, P. (2019). Social anxiety changes the way we move: A social approach-avoidance task in a virtual reality CAVE system. *PLOS ONE*, 14(12), e0226805.
- Leszkowicz, E., Linden, D. E., Maio, G. R., & Ihssen, N. (2017). Neural evidence of motivational conflict between social values. *Social Neuroscience*, 12(5), 494–505.
- Mahmoudfakhe, H., Shiri, H., & Rezaei, N. (2023).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nd self-compassion therapy on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 anxious female students of the second year of high school. *Positive Psychology Research*, 9(3), 63–82.
- Markauskaitė, R., & Rūtelionė, A. (2022). Causes of consumer materialistic and green value conflict: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ustainability*, 14(9), 5021.
- Morgenroth, T., Ryan, M. K., Rink, F., & Begeny, C. (2021). The (in) compatibility of identities: Understand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work-life conflict through the fit with leader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0(2), 448–469.
- Rabinovich, A., & Morton, T. A. (2016). Coping with identity conflict: Perceptions of self as flexible versus fixed moderate the effect of identity conflict on well-being. *Self and Identity*, 15(2), 224–244.
- Rafaeli-Mor, E., & Steinberg, J. (2002). Self-complexity and well-being: A review and research synthe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6(1), 31–58.

- Sagiv, L., & Schwartz, S. H. (2022). Personal values across cultur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3, 517–546.
- Schuster, C., Majer, J. M., & Trötschel, R. (2020). Whatever we negotiate is not what I like: How value-driven conflicts impact negotiation behaviors, outcomes,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0, 103993.
- Schwart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 1–65.
- Schwartz, S. H. (2012). An overview of the Schwartz theory of basic values. *Online Reading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2(1), 1–20.
- Senftleben, U., & Scherbaum, S. (2021). Mid-frontal theta during conflict in a value-based decision task.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33(10), 2109–2131.
- Seymour, B., Singer, T., & Dolan, R. (2007). The neurobiology of punishment.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8(4), 300–311.
- Skimina, E., Cieciuch, J., & Revelle, W. (2021). Between-and within-person structures of value traits and value states: Four different structures, four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9(5), 951–969.
- Skimina, E., Cieciuch, J., Schwartz, S. H., Davidov, E., & Algesheimer, R. (2018). Testing the circular structure and importance hierarchy of value states in real-time behavior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74, 42–49.
- Smallenbroek, O., Stanciu, A., Arant, R., & Boehnke, K. (2023). Are values stable throughout adulthood? Evidence from two German long-term panel studies. *PloS One*, 18(11), e0289487.
- Tang, S., & Li, K. (2021).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machiavellianism and moral identity on the level of anxiety in moral dilemma situations in Chinese stude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615835.
- Töllner, T., Wang, Y., Makeig, S., Müller, H. J., Jung, T.-P., & Gramann, K. (2017). Two independent frontal midline theta oscillations during conflict detection and adaptation in a Simon-type manual reaching task.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7, 2504–2515.
- Veage, S., Ciarrochi, J., Deane, F. P., Andresen, R., Oades, L. G., & Crowe, T. P. (2014). Value congruence, importance and success and in the workplace: Links with well-being and burnout amongst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ntextual Behavioral Science*, 3(4), 258–264.
- Wang, H., King, R. B., & McInerney, D. M. (2021). Conflicting or compatible? Evaluating teachers' self-transcendence versus self-enhancement values from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Current Psychology*, 42, 7224–7234.
- Xie, J.-Q., Yin, X.-Q., Qiu, J., Yang, J., Huang, Y.-Y., Li, M., ... Xiong, J.-R. (2022).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personal values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ssociations with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and life satisfaction. *Current Psychology*, 42, 27232–27244.
- Yanagisawa, K., Kashima, E. S., Moriya, H., Masui, K., Furutani, K., Yoshida, H., ... Nomura, M. (2017). Tolerating dissimilar other when primed with death: Neural evidence of self-control engaged by interdependent people in Japa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2(6), 910–917.
- Yue, T., Anguo, F., Xu, Y., & Huang, X. (2021). The rank of a value in the importance hierarchy of values affects its relationship to self-concept: A SC-IAT study. *Current Psychology*, 41(10), 7290–7296.
- Zahn, R., Moll, J., Paiva, M., Garrido, G., Krueger, F., Huey, E. D., & Grafman, J. (2009). The neural basis of human social values: Evidence from functional MRI. *Cerebral Cortex*, 19(2), 276–283.
- Zavala, B., Jang, A., Trotta, M., Lungu, C. I., Brown, P., & Zaghoul, K. A. (2018). Cognitive control involves theta power within trials and beta power across trials in the prefrontal subthalamic network. *Brain*, 141, 3361–3376.
- Zhao, J., Liang, W.-K., Juan, C.-H., Wang, L., Wang, S., & Zhu, Z. (2015). Dissociated stimulus and response conflict effect in the Stroop task: Evidence from evoked brain potentials and brain oscillations. *Biological Psychology*, 104, 130–138.

Values conflict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mpact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YUE Tong¹, WANG Hong², LI Qinggong³, REN Xiaoxiao⁴, ZHANG Xinyi¹

(¹ Research Center for Psych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²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Psychology,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³ Zhejia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y for the Mental Health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1, China) (⁴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Values conflicts arise when individuals hold competing and mutually exclusive value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two primary types of value conflicts: enduring conflicts, which stem

from deeply incompatible values or identities, and immediate conflicts, which occur when individuals face value dilemmas in decision-making. Both types can trigger a range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heightened stress, increased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tensio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explains the causes and impacts of value conflicts through two main perspectives: the motivational opposition between values and the perceived threat to the integrity of one's self-concep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further clarify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value conflicts, expan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ating factors, examining their effects on individuals, and developing media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values conflicts, value theory, self concept threat, circular continuum of values